

NEW EXPLORATION TO CHAMBER
OF COMMERCE ECONOMICS

商会经济新探

新型政商关系下商会经济
理念与实践

林雄◎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商会经济新探

新型政商关系下商会经济

理念与实践

林雄◎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商会经济新探：新型政商关系下商会经济理念与实践/林雄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 8

ISBN 978-7-218-11605-1

I. ①商… II. ①林… III. ①商会—研究—中国 IV. ①F7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19987号

Shanghai jingji xintan: xinxing zhengshang guanxi xia shanghai jingji linian yu shijian

商会经济新探：新型政商关系下商会经济理念与实践

林雄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肖风华

策划统筹：曾莹 肖风华

责任编辑：梁茵 廖志芬

封面设计：友间文化

责任技编：周杰 吴彦斌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邮政编码：510102）

电话：（020）83798714（总编室）

传真：（020）83780199

网址：<http://www.gdpph.com>

印刷：珠海市鹏腾宇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17.25

字数：206千

版次：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4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83795240

积极作为 靠前服务 大力支持非公 经济发展

代序

2016年3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看望了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民建、工商联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委员们的意见和建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讲话，尤其是新型政商关系的阐述，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热议。

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独家专访时，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林雄表示，这是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新时期政商关系最为深刻、全面和科学的一次阐述，“习总书记的讲话让企业家吃了‘定心丸’，接下来我们将按照总书记的要求，更好地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大力支持非公经济发展。”

习总书记的讲话让企业家吃了“定心丸”

南方日报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引起了广泛热议。当天，有住粤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的民营企业家在场发言了。你们后来交流过吗？

林 雄 习总书记讲话当晚，我就见到了当时在场的企业家，尤其是在会上发言的民营企业家，如全国政协委员、深圳研祥集团总裁陈志列。他们都说“非常激动，很受鼓舞”，普遍反映说习总书记的讲话让他们吃了“定心丸”。尽管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但习总书记的讲话，也增强了企业家们攻坚克难的信心。这是习总书记针对新型政商关系最深刻、最全面、最科学的一次阐述。与企业家交流的过

程中，我们都感到很兴奋。

南方日报 您如何理解习总书记的讲话？

林 雄 我认为习总书记主要讲了三层意思。第一层，习总书记借助联组会的平台，向社会宣示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讲“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掷地有声地回应了大家的关切，向社会传递了积极信号。

第二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了很多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措施，肯定了这些年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但一些政策需要细化、量化、配套，以更好落地。习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要“三落”，即让好政策、好措施“落地、落细、落实”，这种提法很新颖。习总书记还说“让民营企业家真正从政策中增强获得感”，这也是企业家的心声。我们调研发现，近年省里下发了不少文件，如关于取消部分收费，给民营企业家减负的文件，但我们最近与一些企业家交谈，发现他们并不知道这类文件的存在，有的市、县也没有取消收费。尽管中央下文、省里下文，但有些地方因各种原因无法落实。费还在收，企业便没有获得感。可见，习总书记的讲话是有所指的，很有针对性。

第三层，习总书记谈到了新型政商关系。他概括地用“亲”“清”二字，形象、辩证地阐述这一社会关切的问题，把分寸、界限和方法都讲清讲透了。这两个字既对官员有要求，也对企业家有要求。一方面，官员有责任扶持企业，不要害怕和企业家打交道；另一方面，打交道是君子之交，不能勾肩搭背，不能搞利益输送，要把握

好分寸，把握好度，一切出于公心。

南方日报 学习贯彻习总书记的讲话，应把握好哪些要点？

林 雄 我认为要把握好四个关系。一是把握好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像习总书记说的，不是互相排斥、互相抵消的关系，我的理解是它们不是“零和游戏”、非此即彼，而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

二是把握好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的关系，这也是习总书记讲话的第二层意思。这么多好政策、好措施落不到实处，是习总书记讲的政策执行中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这种情况要改变，就得做到“三落”，真正让企业有获得感。这既讲了政策的“含金量”，又强调了政策的落实。

三是把握好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的关系。这对关系的重点在非公经济人士的健康成长上，要“两手抓”，一手鼓励支持，一手教育引导。要特别注重抓“新生代”代表人士的工作。

四是把握好官员和商家的关系，也就是新型政商关系。官商不能勾肩搭背，也不能背靠背，企业家遇到困难，统战、工商联、经济部门的官员都有责任做好服务，给予帮助。我们要和企业家交朋友。企业家信心不足会让他们不敢放心大胆投资，甚至导致资金外流。企业家是创造财富的群体，他们都没有信心，怎么应对经济下行呢？

民营经济是名副其实的重要支撑

南方日报 广东民营经济占全省经济比重超过一半，习总书记的这番话，对广东而言有着怎样的意义？

林 雄 民营经济是广东经济名副其实的重要支撑。从增加值看，2015年，民营经济完成增加值38846亿元，同比增长8.4%，占全省经济比重53.4%；规模、就业人员都占半壁江山以上；税收比重达47.3%。民营经济对广东发展，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十三五”发展目标的实现，都有重要意义。今年（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入决胜阶段的第一年，习总书记的讲话有重要现实意义，回应了社会上的重大关切，大大增强了企业家的信心。

南方日报 在您看来，广东民营企业面临怎样的问题？

林 雄 广东的民营企业自身发展存在差距，科技创新能力和走出去水平不高，在发展环境上有三个问题比较突出。一是市场准入存在障碍。民营企业平等竞争的主体地位仍未完全确立，特别在产业政策和金融政策方面，民营企业受歧视的现象仍然存在。二是企业负担较重。调查显示，我省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中的国家项目仍保留29大项，企业用工成本压力不断增大，49.2%的企业认为用工成本高，主要是因为近几年我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快速上涨，超过50%的企业缴纳的“五险一金”已占到工资总额的30%以上。三是融资难融资贵的情况突出。26.5%的企业表示财务状况或经营状况无法满足银行贷款条件，一些金融机构对民企抱有偏见等。

广东要不等待、不观望、敢作为

南方日报 面对目前存在的困难和挑战，广东该重点在哪些方面发力？

林 雄 广东要发扬先行先试、敢为人先的精神，不等待、不观望、敢作为。广东尤其要争取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作为。一是加大

力度放开市场准入，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二是加大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力度，加快推进民营企业转型升级，尤其是重点加强民营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才，特别是“新生代”人才培养；三是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进一步减轻民营企业负担，一方面降税费，一方面降低企业人工成本，并大力支持技改，加快企业机器换人的步伐；四是切实加强金融支持，进一步缓解融资难，如发展担保小额贷款公司，支持企业申请民营银行牌照等；五是推动中小微企业完善内部管理机制，增强内生动力。目前一些银行不愿贷款，往往是因为企业没有完善内部管理制度，信用缺失。因而，要推动并帮助中小微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帮助他们走出融资难困境。

南方日报 我省统战部门在实际工作中，应如何落实习总书记的讲话？

林 雄 像习总书记说的，我们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接下来我们要动员工商界、各级统战部门，共同去做好工作，多与企业家交心谈心，提振士气，共同攻坚克难。

我们将组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座谈，学习贯彻习总书记的讲话。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有关部门也要做好扶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解读和宣传。政府网站要多更新、多宣传；工商联作为桥梁，要多帮助企业深入解读政策。

此外，我们还要切实服务好民营企业的转型升级，在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如何帮民营企业家轻装上阵，恢复活力，迎接新发展；其二，我们要注重做好人的工作，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创二代”“新生代”企业家深入谈心交流，做好教育引导，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做好安商稳商的工作，打消他们的顾虑；第三，我们还要引导非公经济企业人士多承担社会责任。现在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困

难和压力，在我们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希望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多承担社会责任，大家共渡难关，如“光彩事业”“万企帮万村”等活动，都是工作的重点。此外，我们还打算树立一批非公有制经济优秀企业家的典型，通过媒体宣传，树立正面形象，给社会做标杆示范，让全社会了解守法经营、事业成功、操守良好、充满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和企业家的形象，形成良好氛围，共同推动社会发展，也让非公有制经济在这个环境中发展壮大。

【原文刊载于2016年3月10日《南方日报》第A05版】

新型 政商关系 与现代商会 经济

导论

本书的主题是新型政商关系下的商会经济。意在表明，商会经济将成为当今时代新型政商关系构建的重要依托，坚守政商为朋、亲清为范的商会经济将引领中国新商业文明的发展进步。

2016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民建、工商联委员座谈时，强调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三个没有变”的根本指导原则，首次用“亲”“清”二字阐述和概括新型的政商关系。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主体是“政”和“商”，本质要求是“亲”与“清”，而重点难点在于“新型”，落脚点和归宿在于“关系”。正确处理政府、市场社会诸关系，推动商会组织治理变革，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和民营企业企业家健康成长，是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关键所在。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商关系是始终绕不开的重要话题。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商交往在所难免。良好健康的政商关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润滑剂和助推器，而掺杂了私心杂念、利益勾兑的政商关系则是绊脚石和浑水区。有鉴于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阐述全面从严治党时多次强调“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当干部”，“要坚决远离各种‘小圈子’‘小兄弟’，坚决杜绝低俗的投桃报李的行为”，“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

传统的政商关系是官员与企业家之间人格化的“私人关系”，两个利益主体之间边界不清、缺乏第三方监督，在中国“人情”文化影响下具有依附性、投机性和腐蚀性等特征，难以适应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核心任务在于政商关系的去人格化和制度化，也就是要将这种无规则约束的官员与商人之间“人一

人”关系转变为公开有约束的政府与企业（商会）之间“组织—组织”的沟通合作关系。这种政商依附由个人转为组织之间沟通合作机制的建立和形成，需要在原来“私人关系”中引入一个彼此可信赖可托付的“新朋友”。这个“新朋友”正是商会组织。新型政商关系，本质上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商会组织形成发展的实践表明，它与政府和市场都具有极为密切的共同利益和组织渊源，是政府和市场、官员和企业家这两组圆圈的交集。这个交集越大，代表政商关系越密切、政商互动越频繁，尤其是在商会组织居于一个独立社团法人地位时，商会组织开始具有了政商为朋的自主性。政府官员与商人通过商会组织建立起这种“组织与组织”之间的朋友关系，是制度化、规范化和组织化的沟通合作关系，是对传统政商关系去“人格化”的“法人化”建构。

“亲”和“清”是一对辩证关系，官商交往既要“亲”又要“清”，前者要求亲和、友善、坦荡、真诚、积极主动、热情热心，后者要求清白、守法、公平、公正、两袖清风、廉洁干净。同时，还要把握好一个“度”——既不能画地为牢，老死不相往来，“太清而不亲”；也不能走得太近，不分你我搞私利联盟，“太亲而不清”。这个“度”的把握与衡量，不仅需要官员和企业家自身具有高度的自律性和高超的平衡技巧，还离不开外部公平、公正、客观的规范力量——商会组织及其代表的社会各界利益。只有政商之间个人互利的政商关系不是新型政商关系。新型政商关系除了政商之间的“亲清”调和及互利合作，还必须确保不会对第三方即社会公众利益造成损害。因此规范化的“亲清”关系离不开商会组织等社会力量的参与。这是对“亲清”关系的外部监督与协调平衡，官商的“亲”正在于商会组织这一平台上的公开化组织化交流，官商的“清”也在于在商会

组织这一平台上的公平开放性合作。只有这样，官商之间才能敢于“亲”、善于“亲”，才能人人“清”、日日“清”。

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有限资源的配置主要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完成。然而，随着近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各种社会组织加快发展，日渐成为独立于政府与市场两种资源配置力量之外的“第三种力量”。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强调市场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干预；20世纪30年代应对大萧条而兴起的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干预市场；20世纪70年代以来应对“滞涨”而兴起的西方自由经济理论主张受到政府有限调节和干预的市场经济；近年来国内兴起的新供给经济学强调政府制度供给创新，以及政府、市场及非营利组织等主体共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述经济学理论及实践的演变历程表明，包括商会组织在内的社会组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独特作用正日渐凸显。

中国传统文化中庸之道强调不偏不倚，折中调和的处世态度，这要求在资源配置时要调和公正，促进社会和谐。我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兴起墨子墨家、孔子儒家等学术社团，此后两千多年来各种社会组织生生不息，在社会互助、共同体治理、互惠联谊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大分工、大协作的现代洪流之中。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化，以及社会治理结构的变革，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组织的兴起，尤其是商会组织，在构建政府与市场合理边界、推动政府与市场有效互动、促进政商关系“亲、清”和谐、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等方面的角色地位，也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重大课题。

在社会治理变革时代，对商会组织的认识需要新思维。本书将从演进思维、跨界思维、生态思维及网络思维的四个新视角重新认识商会组织功能作用。从演进思维看，中外商会组织及政商关系具有历史传承性和现实建构性，伴随时代变迁而不断演进发展。从跨界思维看，商会组织具有社会公益性和社群利益性的复合属性，是连接政府与市场的重要纽带。从生态思维来看，商会组织是企业家精神自组织的结果，体现了企业家之间、企业家与政府机构之间的相互联动组成了复杂的社会共同体生态圈。从网络思维来看，商会组织是企业家的社交网络，并以此为基础，连接起区域性行业性企业网络、跨国企业全球网络及线上线下结合的商业网络。

以企业家的集体智慧和资源整合等特征的商会经济是新社会时代的新风口。依托商会组织发展起来的商会经济具有合作、开放、分享、共赢四大本质特征，是一种以企业家精神为核心的新商业模式和经济形态。合作，强调的是企业家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依赖，要求企业家从单兵作战走向群体协作；开放，强调的是商会经济是一个对经济主体之间无障碍商业交往的开放系统，要求商会组织从内部互助走向外部开放；分享，强调的是商会组织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要实现商业信息的共享和资源渠道的共用，并充分利用商会建立的信息网络和互利机制走向发展分享经济；共赢，追求的是商会经济要促进所有经济社会主体共同发展，要求从商业共赢走向社会共赢。商会经济遵循民本、民主、民生的商业逻辑，是市场秩序的构建者以及自治性的社会型经济。处于时代发展风口的商会经济，在内源发展、资本带动、组织服务、平台整合等四个方面发挥出重要功能，正显现出越来越大的能量。在经济新常态下，商会经济是有效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内在新源泉，是加速主导产业形成发展的新引擎，是保护外来投资企

业合法利益的新途径，是招商引资的新载体和回报社会的新平台。

作为广东商会经济的主体，新粤商在地域文化、空间形态、企业家精神升级阶段等方面呈现出磅礴发展的势头。由于差异化的地域文化的深厚历史积淀，广东培育发展出广府、潮汕、客家三大特色鲜明的企业家群体，发扬长期的对外交流传统、融入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逐步形成了本土成长、域外抢滩和外来入粤三种空间形态的新粤商，而从企业家精神的演变升级历程来看，广东企业家经历了三次转型，正在进入创造国际品牌价值和诞生伟大企业的新时代。新时代的新粤商，是顺应“互联网+”、创新创业、“一带一路”及自贸区战略等发展趋势而诞生的国际化的企业家，是具有法治意识、创新思维、社会责任、工匠精神的新型企业家，必将成为经济新常态发展的弄潮儿。

深耕本土的商会是广东商会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具有产业型、平台型、杠杆型和枢纽型等多种形态，支撑着广东经济的集聚能力。在域外抢滩走出去的广东商人组建粤商会，不断拓展广东商业的空间疆界，积极参与泛珠三角及国内其他区域合作，主动融入全球经济，提升广东经济的辐射能力。从国内外其他地区走进来的异地驻粤商会带来了外部优质资源，实现了省内外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以新鲜血液为广东经济强身健体。

新的历史时期，广东商会经济立足粤港澳台区域合作，借助“一带一路”战略及自贸区战略，对接全球华人华侨网络，加快形成国际化、一体化、多层次的商业发展新通道和新平台。

资本融合、路径创新、全球布局、泛在网络是商会经济未来发展的四大新趋势。首先，资本融合既是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也是企业家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的融合。其次，商会组织的路径创新将体现出联盟化、品牌化和精细化的发展趋势，组织的变革将为商会经

济的模式创新和风险控制创造条件。再次，商会经济将推动产业链和服务体系的国际合作与全球布局。依托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手段及跨国企业、境外园区基地等物理空间载体，结合全球企业家社交虚拟网络，商会经济将推动覆盖全球、线上线下一体化、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泛在商业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发展。

商业文明是以商业或工商业为发展中心的文明。基于地理大发现及基督教契约精神，15世纪末的荷兰创立了西方第一个资本主义商业文明，此后英国及美国均相继创立了具有自身特色并具备全球影响力的资本主义商业文明，特别是美国凭借雄厚的综合国力，顺应全球化发展，依托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机构构建起来的“美式”商业文明至今仍深刻影响着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历史上，由于自然地理特性及中央集权治理等原因，我国长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极大地抑制了本土商业文明发展，但是延续千年的丝绸之路与传统商帮文化的滋养，特别是近代西方商业文明的渗透与东部沿海地区不断实践探索的推动，中国商业文明的基因不断发展壮大，在新的时代呼唤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商业文明。

西方资本主义商业文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以现代管理制度为手段的商业运作模式。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在此形成发展起来的商业文明，必然是“义利相兼”的商业文明。在新时期，中国完全可以将中国传统文化的“道”与西方现代管理制度的“术”融合在一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上形成新的商业文明。制度文化是现代商业文明的根本，新型政商关系也必然建立在制度规则的基石之上。这种“新商业文明”的本质特征在于把企业的盈利目标和社会利益融为一体。不是说不盈利，不盈利就不叫公司了，但公